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中国的土地和劳动

[英] 理查德·H. 托尼 著
安佳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的土地和劳动

〔英〕理查德·H.托尼 著

安佳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土地和劳动/(英)托尼著;安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10794-5

I. ①中… II. ①托…②安… III. ①中国经济—经
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36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的土地和劳动

〔英〕理查德·H. 托尼 著
安 佳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794-5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3/8

定价: 22.00 元

Richard H. 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4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Beacon Press 1966 年英文版译出

导 言

虽然历史学家一般避免做出预言,但对像理查德·亨利·托尼(1880—1962)这类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怀有深邃思考并因此引发了自己的历史兴趣的历史学家来说,偶尔也会大胆对未来进行窥测。在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的近二十年前,托尼应邀对当时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进行了考察。他作出了如下具有前瞻性的评述:

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终结了满清王朝)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如果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继续剥削农民,或放任他们受人盘剥,就像迄今为止的那种残酷无情的状况,那么,农民革命将接踵而至。这种情况的出现会令人不快,但也是顺理成章的。(第74页)

这一评述只是侥幸言中吗?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种看法取决于作者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全面综合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托尼并不是一个僵化的决定论者,他的预测基于他相信那些害人不浅且毫无必要的政策将会持续下去。这些具有持续性的政策也不一定就不可避免,也肯定不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唯一理由。

否认这里存在的某种侥幸因素,也有点傻气。尽管如此,还是值得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心性使得一位西方学者基于一次短暂的调查,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托尼在他自己的前言中讲述了这次调查的特点和环境。

早在经济发展研究成为一门主要学科很久以前,托尼就清楚地了解欧洲也曾经是欠发达社会,所以他认为也应该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的确,在他多方位的学术生涯中,他还致力于对英国停止迈向农耕社会道路而成为工业社会的情况进行研究。尽管他的著作在历史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论战,但他的著述现在仍然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的路径依据。托尼的重点研究领域而非唯一领域,是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史。早在1912年,他就出版了《16世纪的农村问题》(*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一书,该书对英国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型的社会诸方面做了研究,并被许多学者评价为他的最佳著作。(托尼很有个性地将该书题献给了工人教育协会的两名工作人员。)托尼在研究有关欧洲农业社会变化时掌握了可靠的资料,对他转而研究中国农业社会颇有助益。少数人会因为拥有这类经验而戴上有色眼镜,只会简单机械地研究其相同点和相似性。但托尼不是这样。托尼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农村问题不只是欧洲农村问题的重复。托尼拒绝将中国与中世纪做简单类比,他提出,20世纪的中国问题实际上是具有经济文明特定阶段属性特征的一种问题。对托尼来说,历史从宏大趋势和各个阶段来加以探讨才具有意义。历史也不仅是为满足于在一个名为历史争论的游戏中进行学究式探讨而收集的随机事件。同时,托尼还认识到具体的个人

环境和人类社会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的重要意义,在任何给定的历史阶段,个人环境和人类社会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只是大致相似。

这种宽广而灵活的历史视角就是托尼的主要资产,一种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其他学者甚或更为杰出的学者共享的一种资产。在这些人中,就有马克斯·韦伯。韦伯也对当代政治和现代工业社会的起源抱有浓厚兴趣。他们俩都对清教徒的行为和教义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研究。两人都撰写了至今人们仍在阅读的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托尼的观点与韦伯有很大区别。韦伯根据德国社会背景所提出的问题,勉强可以应用于英国社会。ⁱⁱⁱ 韦伯研究中的沙文民粹主义特点,在托尼的研究中根本看不到。托尼的历史学识和社会批评融合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与贵族人文主义。如果说关于英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是一种产品,那么,这种融合本身就是具有个体性和特殊性的专属于托尼的产品。

托尼研究任何具体问题,都会提出许多与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所提出的同样的问题。但是他基于他所诠释的证据,得到属于他自己的完全不同的答案。正如我稍后将指出的那样,我认为,他能够从 he 讨论的许多观点中获取在某种程度上超过马克思政治怀疑主义的收益。或许,正因为他也是一位怀有人类个人价值信念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一名高等级圣公会信徒,所以,他丝毫都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权威主义的影响。比之马克思主义者或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托尼总是对历史变化中的牺牲者抱有更多的同情,对“进步”的人类价值观有更多的保留。这种人类同情心促使他持续关注统计数字背后的真实人群

和他们的问题。当然,他也是这一领域中杰出的怀疑主义观察者。看看本书第 167 页*的那个令人发笑的例子,读者可以领会这一特点。托尼在那里对中国政府的所声称的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进行了讨论。

托尼的语言运用也表明了他的贵族情调。他的文笔从容而澄澈。历史典故随手拈来,如数家珍。既无牵强勉力附庸风雅之态,也无矫揉造作、故弄玄虚之嫌。其论如高山流水顺势而下,一气呵成。不过,任何提笔作文之人都会承认,果决推断的结论出以淡定
iv 顺畅的文字,都基于作者对具有学术好奇心的读者的本能尊重。他字里行间不经意的嘲讽,不时放缓一下行文的节奏。在我的记忆中,托尼著作里的机智犀利,总是指向那些某种程度上的幸运者,他的冷言冷语总是对上的,而从不向下,针对那些处于不幸或痛苦之中的人们或群体。偶然情况下,这些冷言冷语背后也会藏着满腔怒火。根据 1962 年 1 月 19 日的《新政治家》杂志上的一则讣闻,拉姆齐·麦克唐纳提议给托尼封爵,托尼的答复是自斯威夫特论人类头衔之虚荣及“就连狗也不会把罐头拴在自己尾巴上”的教训以来,最尖酸刻薄的言辞。

下面我只重点谈谈托尼对蒋介石治下的中国社会所作诊断的主要方面,因为读者会希望自己来检验和分享托尼的论述。托尼对当时他所看见的中国社会的解释基本上是基于两个相关主题。第一,在西方闯入并创造出寻求政治独立和自由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之前,推动中国社会的动力相对较弱。不存在一个类似于

* 本书所提页码均为英文版页码,参见中文本边码。——译者

驱动西方社会从中世纪末期向我们当今时代转型的资产阶级。总而言之,与其有限的目标相衬,托尼只是满足于记录这一事实,而不寻求对这一事实进行解释。第二,考察的是西方的冲击。西方冲击的结果大大强化了农民起义的潜在趋势,最终出现了受共产党领导和利用的真正的革命运动,不过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托尼小心翼翼地指出,这种突然爆发的农民革命,并不能笼统地认为是土地财产分配不公的结果。在托尼写作本书的年代以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并不存在实质上控制了最大土地份额的强权土地贵族,也不存在大批丧失了土地的农村无产阶级。爆发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就是那些耕作小块土地的农民。托尼恰当地称他们为有产的无产阶级。政治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描述这类革命之历史趋势的有用词汇。上层阶级无法成功地适应商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也在阻止他们融入工商社会,上层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极欲采用政治手段压榨农民的经济剩余。不断增加的人口,再加上缺乏其他机会,迫使日益渴望土地的农民,更加努力地希望获得日益缩小的土地的耕作权。同时,地主、放高利贷者和投机商——常常就是同一个人——也在利用地租、债务清偿和其他诸多手段,搜刮农民的剩余产品。为使这些安排行之有效,依赖于政治杠杆,包括从早前继承下来的传统手段,就成了保证农民工作并上缴钱粮的必要方式。其结果可能是一场革命,但革命未必必然发生。

托尼并没有表明一场革命必然会发生。除了这一判断之外,他还提出了一种明确的补救法。如果没有其他理由,而只是把实际问题看成整个世界普遍存在的相同问题,那么,把这种补救法视

为一种学术的和历史的旨趣而不予理会是一个严重错误。美国过去一直试图在世界许多地方鼓励没有革命的经济的发展,由于这一政策一直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所以,美国已经越来越趋向于直接采用军事对抗政策。迄今为止,由于这种政策的残酷性,所以,很少取得成功。因此,托尼这样思想缜密的人的提议,值得加以认真考虑。在简要评价托尼的提议之前,通过引入其他相关因素及托尼撰写本书以来所发生的事件,将这些提议置于一个大背景下来考虑,可能会有裨益。我就曾试图在我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充分的阐释。

如果上层阶级依然强大并且团结,而且也能力图使用一些从农民那里盘剥而来的经济剩余来推动工业化进程,他们就有可能改变或减轻农民的革命趋向。大致而言,日本就用这种方法摆脱了现代化[可能带来]革命的危机。德国也因为某种不同的原因而避免了危机;但另一方面,代价则是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当然,我们不可能证明,不经过革命之火的洗礼就会引发法西斯主义时代,尽管如此,这两种证据还是强烈地指向了这一结论。一种证据是旧的社会形态在德国和日本的延续,这一延续给相对较弱的民主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并因此在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胜利中发挥了作用。另一类证据是这样的事实,即每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和美国,都经历过革命或国内战争——差别主要在语义学意义上——因此每个国家都在消除了差异的同时,也消除了通向资本主义民主的主要障碍。印度没有经历过革命,但印度的确拥有一个不仅具有表面形式的民主政府。不过,迄今为止,印度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动力还很微弱,因此,印

度人还是以一种骇人的方式忍受痛苦并将继续忍受痛苦。

根据历史记载,很显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和平转型,远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这种转型造成的代价或后果,非常近似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代价也很可怕,当然,导致了资本主义出现的工业革命的代价也不轻松,虽然这两种代价的具体程度,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热门话题。事实上,底层民众在世界各地都是产业革命的真正牺牲品。根据人类这些可怕的痛苦经历,人们可能会竭力反对继续在当今世界那些经济落后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产业革命。但我基于两种考虑,反对任何类似的观点。一个考虑是,如果不进行产业革命,大多数人口的生活会雪上加霜。他们要么将沦为积极开拓的强国的牺牲品,要么就要忍受人口增长、经济停滞和饥荒——或者几种情况一起落在他们头上。第二个考虑更乐观一些: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我们或许不用重复19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的可怕后果。稍微夸张一点地说——在技术上并非完全不可能——从现在开始的五十年时间内,某些偏远的国家可能会决定利用本国多年的收入,购买完整的自动化工厂,从而购得没有痛苦的工业革命,这样,我们可以惬意地坐在摇曳的棕榈树下,享受这一成果。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有可能将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从愚蠢的太空竞赛上转移开来,那么,这种前景似乎比将人送上月球更切实际一些。

有了这些考虑,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考察托尼的这些前电脑时代的议论和思想了。他愿意接受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基本是一个农业国家的事实。乍一看,人们可能会对这一假设不屑一顾,接下来会认为这是一种西方的偏见。我认为,这种认识对托尼

viii 非常不公。毕竟,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的近二十年时间,中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而且,托尼希望,中国的农业和工业产出将会稳步增长,同时也会合乎逻辑地稳步组成一个公平而有效的政府。根据当时的情况,托尼按先后顺序提出诊疗方法如下:(1)改善交通状况;(2)改善农业生产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善其信贷、销售和土地租佃;(3)开发大工业基地,以及从土地有限的沿海地区向外拓展。他谨慎地指出,只有在文化氛围尤其是教育制度有了可喜变化的条件下,在一个政府承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条件下(理论上国民党就是这样),所有这一切才有望实现。尽管他确实是根据优先顺序谈到这些诊疗方法,但托尼明显希望这些变化多少能一起出现并相互强化,这些变革才有可能继续。

那么,为什么这种局面没有发生呢?这些诊疗方法有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缺陷呢?由于在真正重要的人类事务方面缺乏实验手段,所以,不可能给出一个完全可信的答案。历史学家凑合着利用一些可疑且常常具有欺骗性的工具来进行事后的比较。因此,我权且提出,这种方法有缺陷,它采取的是一种缺乏政治洞察力的方式。在托尼撰写本书的时候,国民党明显扭转了之前的左倾路线已经有好几年了,此前国民党是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突然的改变,是因为国民党内的保守因素,即沿海港口城市的早期资本家精英和农村的地主阶层,担心国民党早期路线会引发革命。国民党已经变成了托尼所描述并谴责的以剥削他人为基础的政党。要求国民党实施托尼建议的改革,基本上就是要求他们进行政治自杀。毫无疑问,中国当时也有很多身居高位的人希望达成托尼所提议的现代化。但他们表达的想法完全没有考虑

ix

到实际的政治现实。毋庸讳言,这也是美国支持的改革者在世界多个地方的举动。由于更多地接触了马克思的怀疑论,托尼将讨论重点放在了中国的政治障碍及其社会基础上。

这种观察并不意味着,蒋介石出于托尼也没能全面理解的某种内在社会学决定论而注定要失败的命运。政治领导人经常改变支持他们的社会基础。当然,如果他们想要获得成功,他们肯定会在社会中寻找他们之所想的强势群体。不过,除非是很平庸的政治家(而蒋介石并不是),政治行为不会仅仅反映一个社会中若干群体的利益。稳健的现代化和国家的统一,或许只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其他国家迈向这一趋势的后果,就是法西斯主义。这种思路并不特别让人放心。

如果说《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的字里行间尚存在缺少某种政治敏感的不足,尚未透彻了解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激进的政治变革具有必然性,我觉得,这些不足并没有严重削弱本书对革命之前的中国社会所作的解释性描述的价值。事实上,鉴于本书出版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本书的整体分析还是很好地经受住了检验。鉴于托尼所使用的材料以及当时有关中国的知识的状况,本书确是一本了不起的杰作。尽管从那时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多,但与他讨论的重要问题相关的某些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善。中国现阶段还没有出现自己的马克·布洛赫或乔治·勒斐伏尔,^x根据档案进行仔细的研究,来阐明在旧秩序崩溃和新秩序出现之前后农民的实际状况。我的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同事跟我说,从事这类研究存在大量的技术难题。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葆有自己的价值。根据本书以

及我所知道的其他著作，虽然不可能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为什么发生，但可以让我们了解，一场农民革命为什么给共产党人带来了机遇。

小巴林顿·摩尔

目 录

作者弁言.....	1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农业组织	14
第三章 农民问题	47
1. 耕作方法	48
2. 农产品出售	51
3. 借贷	56
4. 土地租佃	62
5. 贫穷、战乱与饥谨.....	70
第四章 农村发展的可能性	81
1. 中外类似的问题	82
2. 农业政策	86
3. 交通	89
4. 科学与教育	92
5. 合作	96
6. 土地租佃.....	101
7. 干旱与水涝.....	106
8. 人口、人口流动与工业发展	108

第五章 新旧工业制度.....	114
1. 过去的遗产.....	114
2.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129
3. 社会政策问题.....	150
第六章 政治与教育.....	174
附录.....	209
表 I 中国工业发展指数.....	211
表 II 1930 年中国各省工业统计	212
表 III 1930 年中国 29 座城市各行业工人人数和产值	213
表 IV 中国工人数在 30 人以上的工厂数目(除天津)	214
表 V 30 人以上的工厂的城市分布(除天津)	215
表 VI 1930 年中国 29 座城市工人收入和工作时长	216
索引.....	218

作者弁言

xi

本书除了最后一章以外,其余部分原来都是为太平洋国际学会 1931 年 11 月在上海举行的会议撰写的备忘文字。书中内容不仅仅是讨论中西关系,而且触及了中国本身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目前不是很多,有人告诉我,这些文字包含的资料可能会让某些英国读者感兴趣。因此,我现在做了修正和增补,并把它重印出来。当然,对于本书观点及所叙的事实,太平洋国际学会不负任何责任。

对于那些不懂中文、不谙中国历史而造访中国的人来说,要想在中国的经济组织和社会问题研究方面作出原创性贡献,显然是不可能的。本书的企望不大,只是想对几本较易到手的中外学者著作中的材料,进行一个总结,并借鉴书中观点,以支持我与我妻子的看法。为了使读者自己评判各种观点行之有据,著者甘冒卖弄学问的风险,将各种文献逐一列出。遗憾的是,有三本重要著作因出版太迟,未能加以充分采用,这三部著作是: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的《中国的大问题》(*The Capital Question of China*)、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以及康德利甫(J. B. Condliffe)的《今日中国经济》(*China Today, Economic*)。